

台灣政治民主化之鞏固： 前景與隱憂*

游 清 鑑**

壹、前 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的五十年，台灣在戰後快速且平均的經濟發展已創造一個經濟奇蹟，與韓國、新加坡及香港並列為亞洲四小龍引起全球的關切，並在學術界興起一股研究台灣的熱潮。這些研究多數集中在探索台灣經濟成功背後的重要因素：諸如日本殖民政策之遺緒、有利之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之對台開放）、政府有效之經濟政策及人民受儒家文化中崇尚節儉與奮發個性之影響等(Ho, 1978; Winckle and Greenhalgh, 1988)。然而，雖然台灣在經濟發展上受到各界的矚目，民主政治發展的步伐卻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雖致力發展台灣的經濟，卻在政治上實行一黨威權統治，即使憲法明定中華民國為一民主國家，且國民黨也對外宣稱其實施民主憲政之決心，民主政治

*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主辦之「我國與亞太政經發展」學術研討會，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感謝成功大學政經研究所彭堅汶教授和多位與會學者的批評與建議，惟本文論點僅代表作者淺見，缺失之處亦由作者自負責任。

** 作者現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的推展卻由於海峽兩岸的敵對現實而停滯不前。縱然有地方自治及局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早在五〇及六〇年代便已展開，這些選舉措施及結果非但無法造成中央政府的更替，反而成為國民黨政府對內合法化其統治及對外爭取國際支持的手段。

雖然國民黨藉由經濟發展的成就加強其統治的合法性，其利用經濟發展以維持統治地位的重要性卻隨著時間與環境的轉變而遞減。在外環境的改變上，由於兩岸長期對立之僵局無法獲得突破，使得國民黨無法持續地以對抗共黨威脅與完成中國統一的理由來限制人民基本的政治權利，尤其是自七〇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大陸在鄧小平領導下進行一系列之經濟改革而贏得國際聲譽，使得以往國民黨政府藉由其在台灣的經濟成就與有限民主合理化其威權統治，對照中共的極權體制而贏得國際支持的效用大幅減少。再加上中國大陸在國際上對台灣積極之外交封鎖與統戰策略，以及國民黨政府無法提出一個令人民信服的大陸政策以解決未來的兩岸關係，促使國民黨政府無法再以兩岸衝突的僵局作為延緩政治改革的藉口。

其次，同樣起自七〇年代而開始於南歐伊比利半島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也藉由滾雪球(snowballing)及模仿效應衝擊國民黨政府的威權體制，尤其是鄰近的韓國與菲律賓的民主運動與成果，對台灣的統治階層而言是一項立即而切身的警惕；對台灣的反對運動者而言，運用人民力量成功地推翻獨裁者的統治，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在內環境的改變上，續四十多年的經濟發展深切而廣泛地改變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不論是都市化的形成、教育的普及、中產階級的興起、甚至是經濟發展後所產生的外部性，這些社會經濟上的

改變在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Ting, 1991, pp.80-81)因此，自七〇年代開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威權統治開始逐漸鬆動，民國六十六年中壢事件的發生可視為反對勢力對既存威權體制的公開挑戰(Gold, 1986, p.3)，而往後快速成長的反對勢力更加速台灣的政治發展，這些內外環境的變化一方面使的國民黨的領導菁英認識到威權體制之脆弱性，一方面也提供政治反對運動者推動政治改革更多的資源與決心。

置身於第三波的全球民主化潮流中，國民黨雖然在八〇年代以後仍能持續其執政地位，但是整個台灣的政治情勢已有相當大的轉變，政治民主化已成為台灣政治發展的主要課題，民主轉型的過程雖然尚未完成，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性質已有了重要的改變。關於促成台灣民主轉型的因素在學術界已有不少的論述，綜和這些論述，大致上已能對造成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鬆動與促成台灣民主轉型的探討提供有用的參考，而隨著民主化的開展，在九〇年代的台灣已逐步走向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階段，相對於著重國民黨威權統治鬆動過程的研究而言，民主鞏固的研究將探討在民主轉型的後期所可能遭遇的問題。雖然民主鞏固是延續前任政治體制---威權體制---的解體而來，但是導致後者解體的所有因素並非全然有助於前者的成功，同時，民主轉型並非單面向地達成民主鞏固，其產生的許多結果是介於民主政體與威權政體之間的變型，更重要的是，即使某一政體已達到民主鞏固的階段，仍然無法保證民主政體（就如同威權政體崩潰一樣）沒有崩潰的可能。因此，本文之目的不在重述學者有關國民黨威權政體解體的因素，而是嘗試探討現

階段台灣民主轉型走向鞏固的前景與障礙。

貳、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

一、民主化理論簡探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或因國際政治現實環境的影響，或因學術研究興趣的轉移，有相當多學者從事民主化理論的研究與討論，但是由於學者在此議題所採取的研究焦點及途徑不同，致使研究成果並無法達成共識。大體而言，針對不同學者在研究方法的異同而言，主要可分為著重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及政治過程中菁英間的策略互動對某一特定國家政治發展的影響等兩個主要研究觀點。

社會結構研究的焦點包括經濟發展與社會動員、社會組成結構（如中產階級、公民社會的興起）、政治文化等面向的變化與政治民主的關聯性。最常被討論的文獻首推Lipset在一九五九年的「民主政治的一些社會要件」(Lipset, 1959, pp.69-105)，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利用實證比較研究的方法探討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的關係，並得出一個引起廣泛討論與爭議的命題「經濟發展程度愈高的國家愈能維持民主政治」，在Lipset研究之後有許多學者延續此一主題並用更進步的統計方法與技巧從事研究，而這些研究也大致上肯定Lipset的主張(Cutright, 1963; Bollen, 1983; Bollen and Jackman, 1985)。此外，也有學者自社會結構變遷的面向切入，認為民主政治的維持與運作，需要有一股以追求政治穩定並避免劇烈變革的中產階級為民主政治的骨幹；也有學者主張一個能免於國家機關壓制並有法律保障其自主性的公民社會才有助於民主政治的運作。在強調

經濟與社會結構因素之外，政治文化的性質亦經常被認為與民主政治的運作有密切的關聯性，所謂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有助於民主政治維持的論點，已經成為研究政治發展學者所關注的對象。

在上述強調結構因素對民主化影響之重要性之外，強調政治體系內部政治行動者間的策略互動，於七〇年代的拉丁美洲國家民主化的研究中受到相當大的重視。依此一論點而言，不論是一個國家的內部因素或是外在環境的變化如何，民主化的成敗關鍵取決於當時身處政治決策過程的政治菁英之間的互動結果，此種互動主要來自四類政治行動者：在當權集團中的改革派(reformers)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以及反對陣營中溫和派(moderates)和激進派(radicals)之間的合縱連橫，這些互動直接發生在政治過程中而決定民主化之方向與結局。有些學者認為既有威權政體在走向民主化的初期，常肇因統治階層中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分裂，而在反對陣營中的溫和派和激進派除了共同反抗統治階層之外，亦因各自利益不同而採取不同的策略，甚至在此四類政治行動者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線，有時改革者會因利益的考量而變成保守者，或溫和派變成激進派等情況，這種變化也直接影響民主化之結果。也有學者主張，不同陣營之政治行動者之間達成政治協議(pacts)，對未來政治體制的型式與建立方式，求得一共同同意的遊戲規則，以規範行動者間的互動(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 p. 19; Przeworski, 1992, p.108)。

雖然上述觀點皆有不少學者採用，但卻在研究方法論上有不少的爭辯。Huntington (1968)指出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參與與期望遠超過政治制度所能負荷與容納時，經濟發展將造成政治的衰敗。而

O'Donnell (1973)更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案例的研究指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結果並非民主政治，相反的，卻是威權政體的產生。也有學者指出，以經濟發展途徑來研究民主化的關係，容易導致將二者間的相關性錯誤地推向因果論證(Rostow, 1970)。同樣的，學者也指出以政治文化的觀點來看民主發展，有可能單純地將民主政治視為文化的產物，事實上，政治文化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聯應是一個雙向的關係，即政治文化可能影響民主政治的發展，而民主政治的運作亦有可能影響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文化既是政治發展的一個因素也是一個結果，端視地區的不同而定(Diamond, 1992, p. 423)。因此，雖然學者皆同意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對民主政治有重大的影響，但這些因素不應視為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preconditions) (Karl, 1990, p. 5)。

其次，就過程取向的研究途徑而言，本途徑之優點在於將研究焦點置於政治過程中，所強調的是經濟－社會途徑所忽略的菁英決策與互動，使得政治菁英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突顯出來，不再只是一個被動的依變項，同時也是一個可能影響結果的自變項。相對上來講，此種強調政治過程的研究要比經濟－社會觀點的研究具有動態性。但是，此一途徑卻有過份強調政治菁英主觀意願與能力的問題，可能忽略到政治菁英在作決策時所面臨到的困境與限制，如果單純地將民主化的結果視為政治菁英的策略及互動的結果，民主政治將成為菁英間討價還價的結果(Chu, 1992, pp. 36-37)。

基於上述之討論，可以得知企圖用任何單一途徑來了解民主化的問題將是危險的，如只採取經濟－社會發展的途徑來探索台灣的

政治民主化，所得到的將只是一種靜態的、間接的了解；同樣的，如只採取政治過程中菁英互動的途徑，也將忽略了過去台灣在經濟、社會等方面對政治發展的重大影響；最後，在經濟—社會以及菁英策略互動之外的台灣民主化，亦不可忽視外在環境的影響，否則將無法了解到國際社會給予台灣民主化的助力與阻力。因為一個國家民主化的進程不僅受該國內部經濟社會變化的影響，更受國際政治經濟變化的影響。

學者認為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東歐局勢的劇變，其主要原因是由於此地區的霸權國--蘇聯--在Gorbachev實行開放政策後，有助整個地區共產政權的解體，才使得此一地區的國家有機會走向民主化的道路(Nikasson, 1994, P.216)。也有學者舉出國際因素除了排除有礙民主發展的障礙之外，也有些民主化的例子是由外國勢力所直接促成，如運用壓力壓迫非民主政府走向民主化，或支持新興民主國家(fledgling democracies)，或反對任何反民主勢力推翻民主政府的企圖與行動(Whitehead, 1986, p. 44)，二次戰後的日本以及美屬波多黎各便是明顯的例証。因此，就研究台灣民主化的問題而言，必須在這些研究觀點中截長補短，才能對台灣民主化的原因、過程有更全面的了解，方能進一步探討與預期在鞏固階段所面臨的困境與解決之道。

二、民主鞏固

雖然有許多研究文獻討論到民主化過程的起源與結束，但是對於民主化的最後階段－民主政體或典則(democratic regime)的建立問題卻較少著墨。目前對於民主化前期階段的研究：包括前任威權

政體因各種危機或領導階層內部的分裂而開始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直至威權政體的崩潰而由新的民選（民主）政府成立為止，已有相當多個案式或跨國比較的研究。這些研究不僅在數量上佔民主化研究的多數，而且研究內容與結論在某些面向上已有相當的共識，如有關促成威權政體轉型及崩潰的研究上，學者經常指出其原因常由經濟社會現代化造成既有威權政體的解體，或是統治階層內部的分裂，或是外在環境所引發的的統治危機，或是以通稱的合法性危機來解釋轉型的起源(Huntington, 1991)。這些研究對於瞭解威權體制的根本脆弱性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但是在威權體制的解體之後民主鞏固的研究卻相對的不足。對於後威權而處於新興民主化國家的領導菁英而言，推翻威權體制的工作只是民主化的開端而已，與此工作同樣重要（即使沒有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在威權體制垮台之後建立一個新的、可行的民主體制，這項工作才是民主化的最終目的，這一後期階段的民主化便是民主鞏固的時期，或是學者所稱民主化的「第二轉型期」(second transition, Mainwaring, O'Donnell and Valenzuela, 1992, p.19)。

在理論概念上標示出所謂的第一轉型期與第二轉型期的區別，有助於研究上的分類工作。因為民主轉型的過程並非是一條直向的單行道，相反的，民主體制的建立只是民主轉型過程中眾多的可能結果之一。事實上，民主轉型的過程，如同Przeworski所言，充滿著不確定性，有時促成前期民主轉型的因素並非必然是有利於促成後期的民主轉型。最常見的現象之一，便是合法性危機促使前任威權體制採取自由化措施，容許人民有更大的公民自由，並逐步開展

民主化的過程，但是在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由前任威權體制內所解放出來的自由化成果，並無法真正被新的民主體制所消化，造成民主體制的不穩定。同樣的現象可以在後社會主義的前蘇聯加盟國及東歐國家中看到，在這些國家中，早期用以推翻共產黨政府的原因之一：利用有效率市場經濟制度來取代無效率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改善人民生活，並未在共產體制解體後如預期中發生效用，相反的，由於劇烈社會變革所帶來的社會不安定及貧富差距的加大，加上新成立的民主政府也無法保證可以處理這些問題，使得人民在感受上猶如對民主政治「美夢初醒」(disenchantment)一般，讓人民懷疑民主政治的價值所在。這些困境一方面使得民主人士在推動民主鞏固時遭遇強大的挫折，一方面更透露出民主轉型的結果儘管已經脫離威權體制，卻不是民主體制，而是介於威權體制與民主體制之間的變型。

換言之，在威權體制解體後，民主體制並非自然地成為主角，因為在達成真正民主體制之前，任何非民主（有時亦是非威權）型式的政體皆可能出現。就民主轉型的二個重要面向：自由化與民主化的發展而言，常見的變型政體有可能只是一種自由化的威權主義 (libe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or dictablanca)：威權體制的當權者認為藉由給予個人或團體更多的自由以換取更多的資訊和支持，但仍不改變其威權結構，且統治者的行動也不受人民經由公平競爭性選舉的制裁；或者此種變型是一種有限的民主(limited democracy ordemocradura)：雖然作為政治競爭的遊戲規則已經制度化，卻對某些個人或團體仍舊有公民權利上的限制(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p.9; Di Palma, 1990, pp. 154-155; Meaney, 1992, pp.97-98; Schmitter, 1994, pp. 59-60)。這些不同的變型組合顯示出民主轉型結果的多樣性，無法用單純的威權—民主二分法來作區分。

其次，對於民主鞏固認定上的另一個困難便是無法在轉型的過程中間，找到一個時間上或事件明確的分界點，來區分民主鞏固的開端與結束。就民主鞏固的開端而言，學者常以結束威權體制的統治而代之以民主政府(*democratic government*)來認定前期轉型的結束及後期轉型的開始，但是，對於後期民主鞏固結束的認定則缺乏共識(Share, 1987, p.528)。面對此一難題，首先要問的是何謂民主鞏固？民主鞏固在本質上並非單指民主政府體制上的穩定，雖然「鞏固」一詞經常隱含著穩定與持久之含意，但是制度的穩定與持續可能來自政治菁英間權力的互動結果，而與民主政治無直接相關。更重要的是，民主鞏固絕對不是靜止不動的狀態，它並不排除當一些導致體制不穩定的因素與危機出現時，如經濟困境或政治菁英的衝突，造成民主政府的鬆動甚至崩潰(Linz, 1978)。因此，民主鞏固之意義不在於制度的維持不變，而是在制度之下作為政治行動者（包含菁英與一般人民）行為準則與規範的鞏固，換言之，民主鞏固所要鞏固的不只是民主政府的維持，還有一套民主政治典則(*regimes*)的實踐，這一套典則，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規範主要政治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政治行動者應瞭解並接受這些典則作為其行為模式的規範，所以民主鞏固主要的意義乃是建立一套可以有效運作的民主典則(O'Donnell, 1992, p.18)。

至於這套民主典則應如何被政治行動者所實踐？或者說如何去

檢驗民主鞏固的程度？Przeworski (1991)認為民主鞏固首要條件在於使政治行動者瞭解到民主政治乃是解決衝突的唯一方式，任何使用非民主的手段來達成其目的行動都將招致更大的損失。Linz具體提出一個已經鞏固的民主政治(consolidated democracy)必須有下列三個意涵：(1)在行為上，沒有任何行動者企圖創造一些非民主的典則來達成其目的；(2)在態度上，社會上絕大多數的成員相信，即使在嚴重經濟困頓之時，民主制度及程序是解決集體衝突最適宜的方式；(3)在憲法上，不論是政府或是非政府力量，都已經習慣於在新體制下的法令程序與制度設計解決衝突(Linz, 1995, pp.1-2)。不論Przewoski或是Linz，一個已經鞏固的民主社會中的所有的成員，必須將民主政治的制度與典則視為唯一的遊戲規則，任何人想要脫離此一架構而採用非民主的手段來達成其目的時，都將得不償失。

再次，在瞭解到民主鞏固的涵意之後，下一個問題便是那些因素將有助於民主鞏固？上文提到民主鞏固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階段，而是隨著不同因素的影響而走向更加鞏固或是開始鬆動。這些因素有些可能是延續性的，諸如那些導致前任威權體制崩潰的因素；有些則是在民主鞏固的後期階段才出現的。如前文所言，即使某些因素有利於促成威權體制的崩潰，但卻不見得有利於建立一套可運作的民主典則，此種情境的轉變常給予民主人士及團體一個全新的挑戰，因為在民主轉型前期的主要目標乃是推翻既存的、具壓迫性的威權體制，此時期的政治行動者彼此之間即使各自對民主政治的信仰及達成民主化的策略有所不同，卻仍然有一個共同的因素使這些行動者團結在一起，這一個共同的因素便是將推翻既存的威權體

制作為一個普遍的共識。但是，到了民主的轉型的後期而言，政治行動者之間的共同敵人（威權體制）消失之後，行動者在目標追求及策略採用上的差異便逐漸浮現，且可能加劇彼此間的利益衝突，尤其是牽涉到權威性的價值分配時，昔日用以團結一起的牽連早已消失，代之而起的可能是如何在權力重新分配的過程中使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

更進一步說，政治菁英在民主轉型的後期所必須面臨的，不僅僅只是如前期無情地批判前任威權體制政策上的失敗或無能，便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是要具體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才能持續贏得人民的支持，也才能保障民主化的持續進行。在民主鞏固時期，首要之務已經不是「非常之破壞」，而是「非常之建設」，從此一角度而言，民主鞏固的任務實比推翻威權體制的行動來得困難。新的民主政府經常要解決前任威權體制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包括促進經濟發展、減少貧富差距、抑止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這些經濟因素及其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測試新政府的施政能力，雖然這些問題可能在前任威權體制時期便已相當惡化，但是鞏固時期的人民時常忽略此點，而對剛剛成立的民主政府寄予過高的期望，如果新政府政策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那麼新政府所剛剛建立的統治合法性便會受到挑戰。

此外，隨著民主化的開展伴隨著社會的多元化，民主鞏固的另一項重要議題，便是建立一套足以令所有參與者接受的政治遊戲規則。此一遊戲規則包含新政府基本的憲政架構與典章制度的制定與選擇，同時也是決定往後權力分配的憑藉。這一個遊戲規則的制定

基本上可能來自政治菁英（代表各種利益團體）之間的商議與妥協而來，其訂定的原則不在於制度設計的理論完美性，而在其實際的可行性。換言之，在民主轉型的後期中，政治行動者之間所訂定的協定在此時面臨到真正的考驗，而確保此一協定被實踐的首要之務便是，如Linz所言，所有的行動者必須有一個基本的共識：不利用任何可能促成威權主義反撲的競爭策略來掠取利益。只有在此共識之下才能進一步談到民主體制的建立與運作，因此，參與政治協定的政治行動者本身對民主的承諾與使命關係到鞏固的成敗，尤其是當這些政治行動者（尤其是具威權主義傾向者）意識到新的政治遊戲規則在短期將有損其利益時，能否在預見其目前的利益損失，可以在未來繼續服從此一遊戲規則之下，重新得到公平的保障，而願意繼續接受此一新的政治設計，如此才能確保民主鞏固的進行(O'Donnell, 1992, pp.18-24)。

最後，民主鞏固也需要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才能順利推展。這個有利外在環境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經濟景氣，可能是一個國際性的金融援助與市場開放，也可能是一個沒有嚴重戰亂與衝突的國際局勢，或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友邦對民主運動的支持等。當然，如果上述國際環境並不存在，甚至與上述情形相反時，民主的鞏固將顯得格外困難。

參、民主鞏固的變數

一、社會經濟因素的變化

最近在俄羅斯的國會大選中，以葉爾欽總統為首的改革派在選

舉中失去多數，並由多半是領退休金的老年人所支持的共黨左派勢力贏得選舉，左派勝利的影響雖然在葉爾欽強勢總統的領導下不致於發生俄羅斯的「造紅色復辟」（吳玉山，民84年），卻對俄羅斯走向民主化的過程增添新的變數。而造成民主改革派敗選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左派勢力提出更有效的經濟改革措施，而是人民對新政府經濟政策及其施政能力失去信心。在俄羅斯大幅實施政治與經濟的改革時，許多人飽受嚴重社會治安惡化、所得減少及通貨膨脹之苦，令人民有今不如昔的感歎，民主改革對他們而言，可說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此種經濟--社會條件惡化，對新興的民主國家走向民主鞏固的路程增添一項難以克服的困境。

相對於俄羅斯的情況，台灣的民主轉型，常被學者視為典型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現代化結果的一個典型案例(Pye, 1985, p. 233)，即使經濟—社會因素無法完全解釋台灣民主轉型的原因，這些因素提供了民主轉型有利的背景環境，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如同帶給威權政體壓力一樣，經濟—社會因素也替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帶來壓力，尤其是政府一方面必須持續政治改革，一方面又不能讓經濟—社會的發展超出其能力所能掌握的範圍，對政府的施政能力是一大考驗。同時，在持續經濟—社會的發展外，政府所面臨到一項更大的挑戰，便是在強調經濟成長之外的分配，以及矯正成長的外部成本問題。這些問題呈現在政府面前的，便是各種自發性團體的迅速增加，包括公益及非公益團體，要求政府政策的救濟。

台灣在民主轉型期間，大體並無因為政治社會的快速變遷而影響到經濟成長，依據政府統計，台灣在一九八〇年的經濟成長率是

7.1%，一九八五年是5.6%，一九九〇年的經濟成長率是5.0%，一九九二年是6% (Taiwan Statistics Data Book, 1993, p.1)。雖然如此依，據學者的實證調查研究報告指出，自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四年之間，台灣民眾對經濟生活的滿意程度有些微下降的趨勢，而且民眾對政府在經濟政策的期望，也逐漸自優先經濟成長政策轉移到分配性項目中，其中一點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民眾感覺到貧富差距的問題日趨嚴重，而且有必要由政府出面解決。此項調查結果也透露出有相當高比例的民眾，認為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有官商勾結、不合理的稅制等因素，這些因素在本質上都與政府政策有密切關聯，如果政無法及時提出有效政策，那麼經濟問題及其附帶影響，在台灣走民主鞏固的目前有可能成為一項負面的因素（朱雲鵬，1994, p.35）。因此，雖然台灣在近幾年來還能維持相當程度的經濟成長，但是單單經濟成長似已無法滿足一般民眾的真正需求，在成長之外的其它議題，已逐漸取得重要性，也對民主化過程的政府造成政策能力的挑戰。

同樣的，藉由類似中長期性的實證調查研究中顯示，在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四年之間的台灣民眾對一般社會問題的滿意程度也逐年下降，這些社會問題包含工作、教育、司法、醫療、福利、治安及公共安全等與民眾有切身關係的項目，如果以民眾對這些項目以「很不滿意－不滿意－滿意－很滿意」四個衡量指標而言，多數民眾都在不滿意與很不滿意之間（周添城，1994, p.10）。而在經濟社會範疇之外，民眾對一九九〇至一九九四年整體政治表現的態度也是逐年下降，包含各項政府政策的推動，制度的運作以及政府官員與

民意代表的表現等，民眾的反應都是在「差強人意」或是「不滿意」之間，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九四年民眾的政治滿意度有較大幅度的滑落，此種不滿意程度的偏高，顯示政府在處理近來頻頻出現的重大政治問題上的無力（徐火炎，1994, p.1）。

就經濟、政治與社會等總體面向而言，台灣在走向民主鞏固的過程中並無發生太過劇烈的變動。但是，一般民眾在這些方面的感受與態度變化卻有逐漸不滿的趨勢，既使這些不滿程度不致於驅使民眾採取劇烈手段或自力救濟的行為，民眾卻在歷次的選舉中表達了這些不滿。因此國民黨政府雖然自以推動台灣政治民主化為榮，並以此訴求在選舉中要求民眾的支持，但是民眾對國民黨的支持仍然日益衰退，使國民黨從以前在國會立法院佔有絕對多數的優勢地位變成相對多數，甚至是「形式過半數實質不過半」的局勢。造成國民黨支持率持續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國民黨無法有效推動各項公共政策，以及澄清本身與「黑金」問題的關係，絕對是國民黨支持逐漸流失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潛在但日益顯著的政治--社會問題，便是省籍差異對政治民主化的影響。有關台灣族群差異的重要性，主要是源自一些歷史與政治因素使然，尤其以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續影響，以及國民黨政府為因應當時與中國共產黨鬥爭的政治現實，與不放棄其代表整個中國法統等因素，有系統地將當時佔全台人口大多數的台籍居民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連帶使本省籍與大陸籍兩個族群在經濟社會與政治等領域產生差異。此種政治上所造成的省籍差異在台灣尚未走向民主化之前，是一個隱晦的議題，直至七〇年代末

期隨著黨外勢力的興起，抗議少數外省族群壟斷政治資源，突顯出省籍問題在整體政治結構的不平等，同時促使蔣經國總統刻意進行政治本土化運動，經過蔣經國總統政治本土化政策之後，本省籍人士有較多的機會進入較高層級的決策過程，但是，小蔣的政治本土化措施雖有助於紓解省籍差異所造成的潛在壓力，卻也同點出了此一問題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進入八〇年代以後，省籍問題隨著政治的開放而不再是個神秘禁忌，在實際政治運作過程中，政客及團體認識到此一問題的顯著性以及作為政治競爭上的有用訴求，同時學術界也開始有系統地對此一問題作研究，因此才有反對人士在選舉中提出諸如「台灣人出頭天」的口號與訴求，以及部份學者以台灣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論斷台灣的民主化。雖然這些口號與訴求，並未刻意要將外省籍人士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但是本省籍民眾逐漸在政治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時，也意謂為數較少的外省籍民眾無法再用政治手段維持其利益，而必須以平等的地位，與為數較多的本省籍民眾在選舉中競逐政治資源。卻由於二者在數量上的差異，外省籍民眾可以預見在民主化結果下將（暫時）失去許多既有利益，此種心態造就了兩個族群對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及期待有顯著的差異，也因而增加民主化的變數，尤其是經由政客利用此一差異作為其獲取政治利益的手段，使原先並非作為大規模政治動員基礎的族群問題在一些重要的議題，如國家認同上，產生的顯著分歧(吳乃德，1993, pp. 47-48)，對於正處於民主鞏固而迫切需要對國家未來建立共識的台灣而言，過份的強調族群差異將對民主化造成負面之影響。

二、主要政治行動者

(一)執政黨（國民黨）

學者在論及國民黨在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時，常以所謂的「準列寧式政黨」(quasi-Leninist party)來描述國民黨在台灣政治體系中的特性(Cheng, 1989)。依據此一描述，國民黨以一政黨的角色支配了政治系統與社會系統，在政治系統中，國民黨制定政策而由政府官僚體系來執行，「以黨領政」成為黨政運作之原則；在社會系統方面，透過全面性的國家組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控制社會上之利益團體並支持其政治動員。隨著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開展，國民黨的這些政黨屬性亦逐漸改變（不論是國民黨自願或非自願地），此種轉變反映在整個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系統中有二個重要的課題：黨政分立（行政中立與軍隊中立）以及社會資源的分配（電視媒體、政黨的公費補助、黨營事業等）（朱雲漢，民81年）。

在黨政分立的問題上，國民黨執政的型態最常被批評的便是行政不中立及軍隊無法國家化的問題。就行政中立而言，國民黨在各階層的行政部門皆維持密切政黨關聯性，雖然就政黨政治觀點而言，重要的政府官員，如政務官員，由政黨人士來擔任是一件合理的事，但是在這些主要負責政府決策的首長官員之外，一般政府機關的常任文官卻仍擔任國民黨之重要職務，雖然在文官可否擔任政黨職務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但是就以往的經驗來看，由於政黨組織平行存在於政府的各個科層系統，政黨的決策結果常對行政系統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如果不是決定力）。其次，就軍隊國家化問題

而言，在理論上，軍隊所要效忠的對象應是國家本身，而非效忠某一個人或是政黨。台灣的軍隊藉由政戰體系得以使政黨勢力深入軍中，在黨國合一的情形下，效忠國家與效忠國民黨之間並無太大的距離。軍中的高層將領絕大多數是國民黨黨員，甚至在國民黨中身居要職，如果在將來國民黨成為在野黨時，軍隊是否仍然會對新政府效忠是一項值得考慮的課題。

在社會資源的分配方面，國民黨一項受人批評的地方便是利用其國家統合主義的手法，在社會各階層培植各種功能性團體，以利其社會動員；另一方面則是壟斷大多數的社會資源以作為其經濟上與政治上獲取利益的依據，常使政治上的反對勢力無法站在與國民黨平等的地位上作競爭，尤其是國民黨自身所擁有的黨營事業，成為主要汲取社會資源的工具（陳師孟等，1991）。這些長期在一黨威權體制下為國民黨專享社會資源的情況，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皆必須大幅改變才能使反對勢力有足夠與公平的生存空間。然而，這些資源乃是以往國民黨賴以維持其政權的重要依據，在民主轉型時期無法立刻將這些特權放棄，此種心態在有關憲政體制的改革中至為明顯。

在憲政架構的改革中，國民黨企圖以所謂「最小變動原則」，不對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權責與關係劃分清楚，而在總統與行政院長二者權責無法明確區分的情況下，政治僵局的出現將是阻礙台灣民主化成功的一個制度上的障礙。因為在目前類似雙重行政首長的政治體系中，如果總統及立法院成員的多數分屬於不同黨派時，民主政治中有關責任政治的精神將無法貫徹。同時，一個由人民直接選

出的總統與由人民直接選出的國會同樣具有民意基礎，在二者意見相左之時，缺乏一個衝突解決的管道，一明顯例子便是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美國總統與其國會有關削減聯邦赤字預算的作法無法取得共識，導致許多法案無法推行，也連帶使許多聯邦機構的運作停擺，在此種政治鬥爭的場合中，受害最大的便是一般民眾。

觀諸台灣在過去的憲政體制運作中，尚未出現如此行政與立法機關相衝突的情形，一個重要原因乃是由於國民黨在過去一直相當有效地控制國會機關。但是，自八〇年代開始，國民黨一方面無法在政治系統中持續其絕對優勢，而且國會成員對政黨紀律的尊重上皆有改變，使得國民黨在控制與動員所屬國會議員時會遭遇更多的困難。對於不去釐清總統與行政院長間的權責劃分，或許國民黨本身認為，如欲維持憲政的基本運作，必須要國民黨繼續維持其優勢地位才能防止政治僵局的出現。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任何正常運作下的民主國家，都無法將政治穩定完全寄託在某一個政黨可在國會中永遠佔有多數的假設之上，而且，在民主化之後，任何一個政黨在理論上都有可能取代國民黨國的多數，或是贏得總統選舉，如果此一問題無法解決，在國會中的多數黨與總統是不同政黨時，則恐怕爭權譟過的鬥爭將遠多於政策的推動與協調，也將阻礙民主化的進展。

(二)反對黨（民進黨與新黨）

不可否認的，一九八六年成立的民進黨代表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在象徵意義上，民進黨的成立，代表著一個具有正式且合法的政黨組織出現在長期由國民黨所主控的政治領域中，

國民黨一黨囊括所有社會資源的情況已經有了新的挑戰者，在實質意義上，民進黨的出現對國民黨而言是一個制衡的力量，對人民而言是在國民黨之外多了一項政治選擇。因此，民進黨的出現一方面打破國民黨的獨大局面，一方面也藉由二者間的競爭而加速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加速壓迫國民黨作出更大的改革步驟，諸如解除戒嚴(1987)、報禁(1988)、通過集會遊行法(1988)、修改選罷法與人團法(1989)、通過資深國會議員退職條例(1990)、終止戡亂與廢除臨時條款(1991)、修正刑法100條中的叛國行爲認定(1992)、修正大學法(1993)。這些措施基本上是針對威權體制遺緒的矯正與清除，排除台灣民主化初步過程中的主要障礙。而這些作法也幫助民進黨在其成立之後迅速成長。在此情況下，執政黨將民進黨視為主要競爭對手，為了維持執政地位，國民黨必須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以爭取民眾的持續支持與認同，無法再完全依賴其優勢的黨政資源維持政權，尤其是在選舉活動已經成為台灣人民主要的政治參與場合與遊戲規則時，國民黨已經不再是權力的擁有者，而是成為類似民進黨角色的權力競爭者。

雖然反對黨的成立有助於台灣民主化的推動，但並非保證台灣民主化的完成。民主化的完成除了要有健全的政黨體系之外，更要有良性的政黨競爭，使各個政黨在相互同意的遊戲規則下有機會贏（也有機會輸），或者說是各個政黨都要隨時有執政（或下台）的準備。不論是對成立近十年的民進黨或兩年的新黨而言，除了作為國民黨一個有效的制衡之外，更須提供人民更多功能選擇，才不致於淪為永遠的在野黨。尤其以目前的民進黨而言，單純以制衡功能

而受民眾支持是不夠的，有執政能力或是提出具體可行政策的能力，才是最能說服民眾支持的最重要依據。可惜的是，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人民對民進黨的作為仍狹窄的定位在制衡的功能上，依據學者對政黨形象的調查結果顯示，相較於國民黨，民進黨在一般人民的心目中除了具有制衡的正面形象之外，其它的負面形象，諸如「激進」、「暴力」等皆比國民黨高出許多，而且，隨著時間的增長，愈年輕的民眾愈認為民進黨是傾向激進與暴力的(劉義周，1993)，如果無法改變此一形象，對其執政之路是一項阻礙（中國時報，民84年12月12日2版）。

除了掃除激進暴力的形象之外，民進黨所面臨的第二個難題便是如何處理其台獨立場。台獨問題長期以來便與反對勢力的變遷緊密相扣，雖然不是所有反對運動的認同者皆認同台獨運動，但二者間有深厚的關聯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此種台獨主張在早期為因應國民黨的壓制，而無法直接以台獨之名訴諸人民，直至民國八十年的國大代表選舉時，正式以台獨為主要政治訴求，希望藉此擴大台獨的支持基礎。但是，民進黨將台獨主張列為其黨綱之後並未帶來立即的利益，在八十年的國大代表選舉中，民進黨的得票率及席次都不如理想，此種結果，當然使觀察者將民進黨敗選的原因歸咎於其台獨黨綱。雖然有其他原因解釋民進黨在當次選舉的失利，但是台獨黨綱的提出的確給予民進黨重新檢討其政黨定的問題。歷次經驗調查結果顯示，選民當中明白表示支持台獨的比率約佔一成到一成五之間，其他則對台獨問題持保留態度，且有相當高比例傾向維持現狀（陳陸輝，民國84年，p.73），這種不同意見的分布狀態，是

民進黨在將台獨黨綱作為其基本信條時必須慎重考慮的。

其次，如果民進黨要在民眾前面刻意沖淡其台獨色彩，亦會遭到另一項困難——來自黨內堅決主張台獨人士之反對。此種困境最明顯的例證便是最近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前，民進黨內部對「聯合內閣」（與國民黨共組）的爭議，以及選後與新黨「大和解」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基本上，不論是與國民黨共組聯合內閣或是與新黨的大和解，對民進黨而言都有自歷史悲情走向執政的準備，部份民進黨的領導人也注意到，純粹以感情手法在選舉中控訴國民黨的種種不公之外，民進黨也應真正為執政作準備，在目前無法單獨執政的情況之下，希望能暫時擋下各政黨之間意識型態的差異，共同以政策的制定與推行為合作共識，在如此情況之下，民進黨與新黨的大和解等主張，的確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與成熟。只是，這些主張的原意雖好，卻是窒礙難行，在一方面，民進黨內部主張台獨的人士將會極力反對，因為一旦此種主張得以實現，將使這些台獨主張者失去立場，無法向其支持者交待，因此，造成這些人士的出走或是與黨的疏離將是可能的（陳芳明，中國時報，民84年12月7日，11版）。同樣的，標榜統一的新黨也遭到類似的困難。

除了反對黨與執政黨之間的問題，兩個主要反對黨之間對統獨問題的爭議，也是民主鞏固的一個潛在障礙。Rostow在論及民主轉型的過程時曾指出，一個國家的統一狀態乃是民主化最重要的背景條件(background condition) (Rostow, 1970, pp.350-361)。姑且不論Rostow所提的此項背景條件中的國家統一是侷限在地理意義上，或是置身其中的政治行動者之間的心理認同而言，如果以國家統一視

為民主化的先決條件，則台灣自七〇年代開始的民主轉型至今似乎仍未解決此一問題。但是，自另外一個角度而言，台灣自七〇年代以來的種種政治變化，確已經經驗到民主化的準備期、決定期與適應期，而且這些時期就台灣經驗來看，並沒有明確的前後劃分，而是相互交錯和重複的進行，「統獨議題」便是一個攸關國家認同與民主化成敗的重要因素。

本質上，統獨主張不僅是一種政策的選擇取向，更是國家認同的問題，如果在國家認同的問題上無法解決，則整個政治系統的運作將遭遇潛在的困難，尤其是涉及權力分配時，不同國家認同的政治團體，可能因此一意識型態的不同而影響到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而台灣的民主化則一直受到此種可能性的威脅。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及新黨的統一主張是二股壁壘分明的對立勢力，即使二者皆向人民宣稱其獨立／統一的主張是有條件的，前者是經由台灣二千萬人的公民投票，並尊重投票決定；後者則是著重強調其「不急統」的立場。此種分歧態度的存在，更需要政治菁英施展更大的政治智慧才能異中求同，以減少民主化走向的不確定性。

肆、外在環境

影響台灣民主鞏固主要有兩股外在勢力的影響：美國與中國大陸。二者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前者是台灣民主鞏固的有利因素，後者則是不利因素。二次戰後以來美國與台灣的政治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不論是在早期國民黨建構威權體制或是八〇年代以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美國皆扮演重要的助因(Yu, 1995, ch.4)，就早期

而言，美國基於全球戰略利益的考量，資助國民黨政權以與中共相對抗，在此考量下，美國協助國民黨政府免於中共的解放威脅，並經由連串的經濟援助，使台灣的經濟得以開始發展。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雖以其民主制度自豪，且有意在全球推廣，此一時期美國是以戰略利益來考量與台灣之關係，對當時國民黨實施威權統治的政治現實則不多干涉，雖然偶有聲音批評國民黨在台灣的種種威權措施，仍在國際上予以持續的支持。但是隨著七〇年代中共與蘇聯嚴重的邊界衝突之後，美國的領導人開始思考改變戰略，企圖以中共來牽制蘇聯，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地位因而日漸低微，直到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與中共建交並同時與台灣斷交，台灣與美國之關係逐漸走到谷底。雖然卡特政府刻意將美國傳統所重視的民主與人權放在其對外政策的考量中，但卻是選擇性的使用(Kirkpatrick, 1979, pp.34-68)，即使台灣在當時遠比中共更有機會走向民主，台灣的戰略利益對美國來講，顯然遠低於中共對美國的戰略利益。

但是，美國對台灣與中國的政策考慮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隨著冷戰的結束與蘇聯的解體而有改善。自此時期開始，美國在全球戰略上的首要考慮，已從以圍堵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到因應全球地區性的衝突，用中共來牽制蘇聯的必要性大為減低。同時，在東南亞地區，隨時可能發生衝突且直接影響美國利益的局部區域，包含台灣海峽、菲律賓、南中國海、高棉等地方，為因應這些局部衝突，台灣的地理位置佔有重要的戰略價值(Lasater, 1993)。同等重要的是，自從中共在七〇年代中期所實施的軍事現代化，已逐漸增強其在此地區的霸權地位，包括美國在內及鄰近的亞洲國家，對此皆懷

有相當的恐懼與關切，再加上美國自菲律賓撤出海空軍基地，使其減少在此地區的活動能力後，與台灣保持一個友好密切，即使是否含有官方性質的關係，同樣對美國具有相當大的戰略利益。

最後，一個民主與經濟自由的台灣對美國的整體利益是有所幫助的。在政治上，台灣走向民主自由體制符合美國人權外交與崇尚自由的政治傳統，相對照於中共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鎮壓行動，台灣在八〇末期的連串民主化措施，的確吸引美國朝野間不少的支持與肯定。在經濟上，除了對美軍事物資採購外，台灣逐漸對外開放金融與服務市場、降低關稅及獎勵外來投資等措施，也符合美國所高倡自由貿易的理想。基於軍事戰略與民主理想二者的考量，美國支持一個局勢穩定且民主的台灣應是一個可以理解的事實。

儘管在台灣內部局勢的變化如何，民主鞏固的成功仍須仰賴一個外在因素的配合--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長久以來中共的存在及其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一直形塑台灣的政治發展，此種敵對與威脅給予國民黨早期威權統治的合理化依據。然而，隨著台灣逐步走向民主化的過程，更多具有以台灣發展為取向的台籍政治菁英進入政治過程，雖然在口頭上仍承諾對未來兩岸的統一的期待，這些菁英很自然的必須對台灣內部的事務付出更多的心力，而非強調未來的統一理想。與前代國民黨菁英不同的是，這些菁英一方面體認到中國大陸存在且強大的事實，一方面也瞭解到台灣民眾對統一態度的保留。因此，台灣民主化的結果絕對不是大陸所樂見，而大陸方面極力以各種手段壓迫台灣依其所設定的議程談判統一事宜，將

進一步增加台灣民主化的不確定性。

台灣民主化除了受制於中共對台的政治外交與軍事手法之外，也逐漸受到兩岸日趨密切的經貿交流的影響，尤其在政府開放對大陸地區的探親、觀光、與經貿投資以來，台灣與大陸間的交流早已突破官方所預期與能管制的地步。此種交流，無疑的將對政府企圖用國統綱領所掲橥有條件與漸進的兩岸交流模式產生壓力，尤其是在經貿交流方面，中國大陸一開始以優惠條件吸引外商到中國大陸投資，對所有國家的企業經營者而言，都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大市場，台灣的資本家自不例外。再加上台灣內部近年來高漲的環保意識，逐步減低本土企業營運的利潤，而且台商赴大陸投資比其他國家在語言與交通上及文化習性的適應上，有較大的便利。因此，不論是以大陸作為產品的原料供給與生產，或是以大陸作為產品銷售的市場，台商漸將企業在大陸另闢戰場的趨勢是直線上昇，海峽兩岸間的貿易往來也急遽增加。

依據一份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與大陸的間接貿易額自一九七九年的七千萬美元增加到一九九二年的七十億美元，而由大陸到台灣的貿易額也自一九八〇年的七千萬美元增加到一九九二年的十億美元(Wu, 1994, p.191)。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快速成長的貿易量中，由台灣貨品輸入大陸的成長速度與數量，均遠超過由大陸貨品輸入台灣的速度與數量。此種情形一方面顯示台灣在雙邊貿易中享有相當程度的順差，而且此種盈餘的數量在九〇年以來更有加速累積的趨勢(Ma, 1993, p.209)，但在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台灣經發展對大陸日益增加的依賴程度，此種依賴程度（其測量方法之

一，乃是由台灣對大陸出口值佔台灣對全世界總出口值之比重，表示台灣出口產品對大陸市場之依賴）自一九七九年的0.13%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3.21%，再增加到一九九二年的7.72%（高長，民83，pp. 248-249），此種依賴雖不算高卻值得注意。

基本上，海峽兩邊的經貿往來的確可以產生相當程度的互補作用，但是，海峽兩岸的關係除了經貿文化交流之外，更有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如果兩岸對未來解決政治差異的方式尚未有共識，則目前雙方的經貿往來猶如在沙上築屋，隨時有崩裂的可能。對台灣而言，大陸的開放與改革，固然有助於紓解台灣企業面臨困境的壓力，但是，此種經貿果實並非完全沒有風險及代價，就中共而言，提出各種優厚條件予台商，並非純粹是要得到預期的經濟利益，因台商到大陸投資項目多屬夕陽工業、低經濟效益且常見污染性（法務部，民83年，p. 69）。因此，北京以經貿交流的手段，來迫使台北當局走向談判桌的企圖，是台灣所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中共目前對兩岸經貿交流的看法，應是政治利益高於經濟利益，此點可自一九九〇年，時任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在「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對台工作的通知」講話中了解一個大概：「要從祖國和平的戰略高度認識對台經貿工作的意義。發展雙方經貿往來，密切兩岸聯繫，是遏制台灣分離傾向、促進和平統一的有力措施。對台經貿工作既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又要為促進和平統一的政治任務服務。」（郭立民編，民81年，頁1143）。有鑑於台商逐漸依賴大陸的市場與人力，將使台灣的領導階層在面對中共統一要求時，必須顧慮到已在大陸投資者的利益，而給中共更多予取予求的空間，假設情況演變

到最壞的情況——台灣的經濟高度受制於大陸，則台灣將無對抗大陸的本錢，民主化的成果亦將受到嚴重的傷害。

五、結論

一些政治觀察家及執政黨本身常以所謂的「寧靜革命」來形容目前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的過程，自經濟社會變化的觀點而言，此種論點的確說明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並未造成激烈的社會失序或經濟失控的特色，而且在目前情況下，大致上可以肯定在民主鞏固的時期不會有威權主義的重生可能性。但是不會恢復威權主義與達成民主鞏固之間還有很大的距離，台灣目前正處於如此的狀態之中，有不利因素與有利因素同時並存，橫在目前的問題包含民眾對經濟、社會及一般政治生活的不滿，尤其是有關分配正義及福利政策的要求，不僅涉及到政府政策的有效性，更包含人民對政府期待的轉變。此外，民眾有關國家認同等形塑基本政治態度，大體上是呈現趨中（維持現狀）的狀態，但是此一議題在選舉期間常常成為爭論的焦點，值得憂慮的是居兩極端的民眾（急獨與急統）間的對立有有愈來愈強的趨勢，如果二者無法在中間找到一個妥協點，則對於民主鞏固的共識將難以達成。

最後，對於民主鞏固的最大隱憂與威脅，便是中共的因素與政治行動者對民主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衝突，及因應此衝突而設置的機制無法被接受與實行，此兩項的解決皆需要政治菁英高度的技巧。就前者而言，不論民主化後的台灣是由那一個政黨執政，兼顧兩岸關係與民主發展是一個避免不了的問題；就後者而言，當務之

急便是憲政體制的確立，與擋置意識型態與零和競爭的心態，共同維持新的民主體制的運作，雖然選舉制度的實施已有相當長的歷史，而且此項機制及其產生的結果也能受到政治行動者及民眾的接受，但是此種尊重體制的政治態度仍需要時間的培養，尤其是中央權力在目前為止尚未有和平轉移的經驗，以及憲政體制走向的不確定等皆有待進一步的觀察。台灣的民主鞏固需要時間，且不會比推翻威權體制容易。

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目：

- 朱雲漢，現階段國民黨之組織體質與權力生態，台北：中國時報「超越與重建：迎接中華民國新時代」研討論文，民國81年。
- 朱雲鵬，台灣地區1994年經濟滿意度民意調查分析報告分配部份，台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民國84年，頁33-43。
- 法務部調查局，國人赴大陸投資的契機與風險，台北：榮民印製廠，民國83年。
- 周添城，台灣地區1994年社會滿意度民意調查分析報告總論，台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民國84年，頁1-13。
-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及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理論初探，見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
- 徐火炎，台灣地區1994年政治滿意度民意調查分析報告總論，台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民國84年，頁1-22。
- 高長，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台北：五南出版社，民國83年；陳芳明，聯合內閣可能造成民進黨分裂，中國時報，民國84年12月7日11版。
- 郭立民（編），中共對台政策資料選輯，台北：永業出版社，民國81年。
- 陳師孟等，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1。
- 陳陸輝，統獨立場與選民的態度與政治參與，台灣省長選舉選民投票行為之科際整合研究，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民國84年，pp.70-93。
- 劉義周，台灣選民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民國82年。

二、英文書目：

- Bollen, Kenneth A., (1979).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Timing of Development.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4, pp. 572-588.
- and Robert Jackman, (1985).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Size of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0, pp. 438-457.
- Cheng, Tun-jen,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 16, No. 4, pp. 471-499.
- Chu, Yun-han, (1992).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 Cutright, Phillips, (1963).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y Reivew*, Vol. 28, pp. 253-264.
- Diamond, Larry, (1992). Conclusion: Causes and Effects. In Larry Diamond,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pp. 411-436.
- Di Palma, Giuseppe, (1990).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ld, Thomas B.,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 E. Sharpe.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o, Samuel P. S., (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96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arl, Terry Lynn, (1990). 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pp. 1-21.
- Kirkpatrick, Jeane, (1979).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Commentary*, No. 68, pp. 34-68.
- Linz, Juan J., (1978).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 In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eds.),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art I.
- and Alfred Stepan, (1995). Towards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Five Arenas and Three Surmountable Obstacl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rends and Challenges. Taipei, Taiwan.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pp. 69-105.
- Ma, Ying-jeou, (1993).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Mainland: Taipei's View. In

-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since 1949*.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193-211.
- Mainwaring, Scott,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1992). Introduction. In Mainwaring,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p. 1-16.
- 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1992). Liber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KMT. In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pp. 95-120.
- Niklasson, Tomas, (1994).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1988-9: Interactions between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In Geoffrey Pridham and Tatu Vanhanen, (eds.),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pp. 191-219.
- O'Donnell, Guillermo, (1992). Transitions, Continuities, and Paradoxes.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p. 17-56.
- and Philippe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In Guillermo O'Donnell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wrence Whitehead (eds.),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 (1973).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Berkele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Przeworski, Adam, (1992). The Games of Transition.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p. 105-152.
- ,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ye, Lucian W., (1985).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stow, Dankwart A. (1970).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3, pp. 337-363.
- Schmitter, Philippe C., (1994). Dangers and Dilemmas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 No. 2, pp. 57-74.
- Share, Donald, (1987).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9, No. 4, pp. 525-548.

- Ting, Tin-yu, (1991). Socio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omas W. Robinson (ed.),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Taiwa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AEI Press.
- Winckler, Edward and Susan Greenhalgh (eds.), (1988).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New York: M. E. Sharpe.
- Wu, An-chia, (1994). Taipei-Peking Relations: The Sovereignty Issue. In Bih-jaw Lin and James T. Myers(eds.), *Contemporary China and Chang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p. 187-198.
- Yu, Ching-hsin, (1995).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Democracy: A Study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